2005 年拉丁美洲研究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拉美研究在中国”课题组*

2005 年, 中国拉美学界十分活跃, 举办了一些列大型学术研讨会,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主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 年的拉丁美洲”,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共同主办了“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 美国与拉美的合作与对抗”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主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大使论坛“巴西的大国地位与大国战略”,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举行了“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 中拉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拉丁美洲经济技术合作小组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共同主办了“21 世纪论坛: 可持续发展——中国与拉美”等学术论坛和研讨会, 中国拉丁美洲历史学会举办题为“ ”的年会。广大拉美学者围绕一系列重点和热点问题深入研究, 取得丰硕成果。

一 对拉美经济的研究

(一) 对拉美经济改革的评估

对拉美经济改革的总结性研究仍在继续。有的学者指出, 拉美的改革不是政府而是非政府行为, 是有议会主持立法, 依法实施改革方案。改革是个法制化过程, 这是优势的一面。但是改革涉及到政府的职能而政府则不能发挥它应有的职能作用。另外, 拉美的改革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和增加就业的关系, 却使群众贫困化日益加剧, 没有把握好改革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依存度, 没有处理好私有化产权转移过程中, 群众和政府的利害关系、劳资利益的关系, 当权者甚至损害或牺牲群众利益, 去推行改革措施。^①一些学者在总结巴西改革的经验教训时指出, 其成功之处在于从法律和制度上堵住公共开支赤字的漏洞, 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经济改革以法律为基础。其主要失误是: 缺乏有利的政治领导和战略目标; 改革基本上是顺从欧美国家的意愿, 核心内容是“贸易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国企私有化”, 试图建立一个类似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自由经济模式; 过分地强调市场经济作用, 忽略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指导和调控作用; 过分地强调经济的“稳定”, 忽略了社会发展的要求。^②

(二) 关于经济现代化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 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而后再回到出口导向型战略, 结果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经济体制经历了“市场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彻底的市场自由化”的转换。所有制形式则从注重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的控制过渡到“私有化的控制”。农业的现代化是在大地产制的基础上, 通过农业机械化、化学化和科学技术的改造来实现的, 它限制了中小农户的发展, 把大批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迅速排挤出去。尽管农业现代化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其二元经济的特点依然存在, 在

* 课题组组长: 蔡同昌, 成员: 刘维广、高川生、张颖。此文由高川生撰写经济部分, 刘维广撰写政治部分, 蔡同昌撰写国际关系部分, 张颖撰写社会和历史部分。

^① 蒋光化:《对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看法》, 载《走进拉丁美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第 96 页。

^② 吴志华:《巴西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失误》, 载《走进拉丁美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第 300 页。

印第安人聚居地区,落后的自给自足型农业仍占主导地位。另外,伴随经济现代化的城市化具有“超前”性。多数国家的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产生失调。拉美地区被称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的地区”,是一个高度贫富分化的社会。^①

(三) 关于智利模式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智利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一是审时度势,顺应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很好地利用了本国的资源优势 and 劳动力优势。二是在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基本方向不变的条件下,根据形势变化而灵活调整政策,修正某些极端的主张。智利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运作相对“透明”和更讲“效率”,以法治国的特点比较突出。三是在稳定和增长的前提下,兼顾公平,追求和谐发展。^②汇率制度市场化是智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利的经验表明,有准备、有步骤地退出钉住汇率制既可以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使汇率的形成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又可以减轻汇率波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对于实施钉住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一个退出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各国存在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差别,具体的转换路径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是智利的实践仍可以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③智利的模式也暴露出负面影响,如政府紧缩公共开支,使广大群众的卫生、教育等状况恶化,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集中到少数几家大财团手中。^④

(四) 关于“拉美化”的研究

对于“拉美化”,学者中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将“拉美化”界定为:第一,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一种经验性现象的描述和比喻,而非严谨的学术语言。第二,英文与西文和葡文语境中的含义略有差异,前者适用的范围较宽,而后者较窄,含义相对固定并约定俗成。第三,“拉美化”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主要将之视为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的代名词,超出这些范围的可以看作是广义的理解。第四,将广义的比喻用来对待和比喻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目前“拉美化”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第五,广义的理解和无限制地延伸中国“拉美化”的比喻范围和描述清单,不仅不符合拉美国家的实际,而且对中国来说其潜在的结果和效果都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第六,企业界人士广义“拉美化”的讨论对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⑤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化”主要是指拉美国家严重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是指贫富差别达到了某种严重程度,而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⑥还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化”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不应盲目地使用“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等提法,因为这些提法缺乏明确的、公认的含义。^⑦

(五) 关于西半球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包括西半球在内的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呈现以下一些特点: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深化型转变;寻求静态经济效益逐渐转向寻求动态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南南型合作逐渐让位于南北型合作;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让位于区域经济合作组

^① 吴国平:《立足学科前言,联系中国实际,建设一流的中国拉美经济学科》,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9页。

^② 韩琦:《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和经验》,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5页。

^③ 黄志龙:《钉住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换:智利案例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第48页。

^④ 王晓燕:《智利经济改革的特点》,载《走进拉丁美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 郑秉文:《如何看“拉美化”:兼论完善我国社保制度的必要性》,载《红旗文稿》,2005年第6期。

^⑥ 苏振兴:《“拉美化”主要是指社会分化》,载《走进拉丁美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⑦ 江时学:《“拉美化”是伪命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

织之间的竞争。^①按照 1994 年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规定,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最后期限不迟于 2005 年 1 月,执行美洲自由贸易区协议不迟于 2005 年 12 月,但美洲自由贸易区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如期建立,^②而且委内瑞拉公开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主张以“玻利瓦尔美洲联盟”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南美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较快。在 2004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上,南美 12 个国家的元首或总统代表签署一项声明,宣布成立南美国家共同体。这是南美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它必将促进南美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推动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③在回顾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 10 周年时,有的学者指出,经过数量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④

(六) 关于拉美国家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后的经验与教训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⑤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这时国内需求、产业基础和对外经济关系均形成了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如何既要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又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学者们从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对外贸易战略、资源环境、政治变化和 international 地位变化,以及如何协调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等多个方面和角度,同时对比东亚国家,研究和分析了拉美国家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后的发展。^⑦一些东亚国家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后,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一些拉美国家则由于经济波动长期增速明显较低。20 年后,以上两类国家的国民经济水平出现了巨大落差,一些东亚国家进入了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拉美国家仍徘徊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究其原因,拉美国家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慢,无力支撑社会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快经济增长上,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加剧,经济波动还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⑧

(七) 国有企业改制的效率与公正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从改革效益看,拉美国有企业的改制在技术改造、提高竞争力、增加企业利润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在社会公正方面,国有企业私有化对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影响,公共服务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弱了政府的社会政策,私有化加大了私人资本在高新技术领域和战略资源领域中的垄断地位。拉美国家国有企业改制的经验教训比教丰富。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法律先行,通过立法来规范国有企业改革进程;(2)采取多种形式确保国有资产增值或保值;(3)政府必须在私有化全过程中,对改制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既对私有化过程进行监督,又对私有化后的企业进行监管,监督企业转制协议的落实;(4)从各国的国情出发,在不同领域和不同企业采取不同的做法,包括经营权租让、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控股、和国有资本独资等多种形式;(5)在私有化过

^① 李向阳:《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杨志敏:《对当前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童炳强:《南美一体化从梦想到现实》,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杨志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0 年历程评析》,载《2004~2005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年。

^⑤ 苏振兴:《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的考察》,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⑥ 郭克莎:《人均 GDP1000 美元后的长期发展进程——东亚和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载《开发导报》,2005 年 1 月 6 日。

^⑦ 江时学主编:《2004~2005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217~309 页。

^⑧ 郭克莎:《人均 GDP1000 美元后的长期发展进程——东亚和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载《开发导报》,2005 年 1 月 6 日。

程中，确保企业职工的利益以减少企业所有制转变所造成的社会代价。^①

（八）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一些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制约着经济增长。拉美经济依赖对外部门的状况没有改变，这使得拉美经济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在拉美出口产品的结构中，基础产品和原材料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产品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具有易受经济周期性变化影响的特性，其国际市场的价格常常随世界经济或主要进口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而跌宕起伏。此外，拉美多数国家的出口还主要集中在少数几种基础产品或一些拉美国家资源型原材料中，因而其脆弱性的一面就更加突出。拉美经济的另一个结构性矛盾在于，劳动力的急剧增长和生产领域中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相对萎缩，造成经济增长的同时就业能力却相对减弱。近年来，拉美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趋向于较少使用劳动力或者大量使用进口材料、技术和资金的部门，也就是说这些部门的最终产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相对较低，因而经济增长对减少失业、增加就业的影响极为有限，从而在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失业率和经济同步增长的局面。^②

（九）中拉经贸关系研究

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与广大拉美国家的有力推动下，中拉经贸合作稳步迈进，显现出巨大的经济互补性和合作潜力。目前，中国在拉美的四大贸易伙伴依次是巴西、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此外，中国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乌拉圭等国的贸易额也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中拉双边经济合作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圭亚那、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均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05年11月18日中国和智利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中智经贸合作和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将带动和扩大中国与其他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有助于克服制约双边贸易发展的障碍，为经贸合作的大发展创造互信气氛和良好环境。^③

中国积极采取“走出去”战略，但自2005年1月1日纺织品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后，纺织品贸易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纺织品出口大国，受到一些国家的责难。有学者认为，中国解决与拉美国家的纺织品摩擦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中国与拉美国家具有较大的经济互补性，能源、矿产和其他初级产品的大量进口与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大体持平，而与一些大国，如阿根廷等持有一定的贸易逆差，这为从总体上筹划和运作双边贸易缓解纺织品贸易摩擦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中国与拉美国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政府间沟通渠道十分畅通，十分有利于妥善解决纺织品贸易问题。^④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对拉美市场的开发呈现以下一些特点：（1）进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发展都比较快，但是占中国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的比重均较低。中国对拉美投资市场的开发比较晚，投资规模比较小。（2）出口商品种类广，但高附加值产品不多。（3）贸易经营主体多样化，但大型企业较少。（4）投资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大，但资源开发性投资多，生产性投资较少，而且个体投资规模均不大。（5）投资逐步扩大到科技领域，但是并没有形成企业投资规模。从以上情况来看，中国对拉美商品和投资市场的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和较低水平。目前，在拉美市场开发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企业开发市场存在短期行为和盲目性，缺乏国际化经营的战略意识和有效的战略设计；企业制度、决策机制和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国际化经营人才；对外投资法规、政策和管理体制不健全，企业缺乏政府和金融部门的大

^① 吴国平：《立足学科前言，联系中国实际，建设一流的中国拉美经济学科》，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9页。

^② 吴国平：《经济持续好转 痼疾依然存在》，载江时学主编：《2004~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③ 王鹏：《2004年中拉关系回顾》，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宋晓平、曹因：《如何看待中国纺织品贸易的竞争优势》，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

力支持；对拉美国家的投资环境了解不够，研究不足。^①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目前，进口石油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30%以上。有学者认为，中拉石油合作是中国与拉美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原材料全球采购的重要一环。中拉石油合作既有助于中拉关系的改善，也有助于促进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②

二 对拉美政治的研究

（一）关于拉美的现代化^③

有的学者指出，现代化的启动与转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第三世界国家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变革过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模式包括“模式”与“现代化”双重含义。有的学者把现代化决定因素概括为五个内部因素（政策、制度、文化、地理和政治）以及外部因素，以此探究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背后的根源。还有的学者提出，现代化可以有不同模式，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发展模式。与多数学者看法不同的一些观点包括：有的学者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后发劣势等难题；有的学者则认为“赶超战略”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并认为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后设的理论，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历史易陷入“历史目的论”。

有的学者认为，拉美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拉美现代化进程饱含曲折性与不协调性；二是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拉美国家的“内部回应”迟缓，丧失了发展机遇；三是拉美国家存在着“反现代化”现象，即只是在形式上和表面上接受现代化，实质是为了控制现代化，维护传统价值。有的学者总结了拉美政治发展中的四点经验：现代化最基本的政治诉求是政治稳定，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强国之道在于要建设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强大政党，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

（二）关于拉美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在最近50年间经历了前后两个政治周期。前一个周期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拉美经历了一次代议制民主与军事独裁的交替过程，但六七十年代拉美的所谓“军事威权主义”政府与历史上的军事考迪罗政府有明显的不同。第二个政治周期始于70年代末出现的以军人政权“还政于民”为中心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后一个政治周期中，拉美没有重复民主与独裁交替的历史，但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广大民众从对民主政治的热切期待走向了对政治民主的巨大失望。^④

有的学者认为，在政治上，拉美国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已经危及民主政治的发展。^⑤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的民主化进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如何认识拉美民主化和民主问题上，不少人出现了困惑。有的学者为此专门评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报告《拉丁美洲的民主：公民民主的未来》，认为该报告列举了拉美民主的现实困境，剖析了民主和民主政府的内涵，并认为报告对拉美公民民主权利的进步和缺陷作了评价，对拉美民众以及精英集团对待民主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和透视。^⑥

^① 宋晓平：《中国开发拉美市场的重大战略决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1月。

^② 刘强：《中国与拉美石油合作探讨》，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上述观点出自一些学者向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苏振兴的《关于拉美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的思考》，林被甸的《现代化研究中的不同观点》，韩琦的《一致性与多样性：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中的两种视角》，江时学的《现代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曾昭耀的《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几点经验》，等等。

^④ 苏振兴：《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7~9页。

^⑤ 袁东振：《对拉美国家社会冲突的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8页。

^⑥ 贺钦：《对拉美民主的解析——读〈拉丁美洲的民主：公民民主的未来〉》，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

（三）关于拉美发展进程中的政治思潮和理论分析

有的学者通过考察威权主义政体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地位，认为威权主义政体一词的使用丰富了国家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和内涵，使对国家政体形式的认识和定位更加具体和准确。威权主义政体是介于民主政体和独裁政体之间的，各国在民主制度建立以前经常采取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内涵是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威权主义政体大体可分为早期威权主义政体和现代威权主义政体。^①

有的学者认为，兴起于拉美的依附论是以不发达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宏观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经委会主义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二战后拉美社会经济现实的现实是其基本立论依据，主流派现代化理论是其直接批判对象。依附论虽不完善，但在研究方法、价值取向甚至某些结论上，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全球化条件下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②还有的学者指出，依附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未得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视。^③

有的学者探讨了拉美发展模式的制度创新问题，认为拉美国家与北美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受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传统的严重影响，二是拉美国家没有积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拉美国家的统治阶级曾尝试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制度性障碍，拉美国家的制度性死结一直困扰各国。^④

有的学者对卡洛斯·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作了评介，认为，小国也有外交，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主权关系呈不平等的等级状态，促进经济发展应是外围国家外交的首要目标，外围国家与发达国家冲突的代价高昂。^⑤

有的学者认为，拉美的民众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由于民众主义具有“多阶级”和“平民化”的特点，它调动了以非正规部门就业者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将在中下层民众纳入政治参与进程。在拉美特殊的社会结构下，以非正规部门就业者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和普选制为民众主义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⑥

（四）关于拉美国家的政治形势与政党格局

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2004~2005年拉美的政治形势总体稳定而局部动荡，拉美政局的中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⑦

学者们普遍加强了对拉美国家政党的研究。有的学者综合研究了拉美国家的传统政党，并概括出一些共同特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相继衰败。拉美传统政党的衰败带来了多重政治后果，它导致民众对其逐渐失去信任和信心，在一些国家削弱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传统政党的衰败往往伴随着政治冷漠主义的复兴，也凸现了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危机。^⑧也

第6期，第74~75页。

^① 冯秀文：《世界政治史研究中的威权主义及其历史定位——以拉丁美洲为例》，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第27~38页。

^② 孙来斌、颜鹏飞：《依附论的历史演变及当代意蕴》，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第70~76页。

^③ 孙若彦：《依附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④ 尹朝安：《拉美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33~38页。

^⑤ 孙若彦：《评卡洛斯·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第38~43页。

^⑥ 李永刚：《拉美非正规部门初探》，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49~51页。

^⑦ 杨建民：《近几年拉丁美洲的政治形势》；焦震衡：《查韦斯为何取得公决的胜利》；谌园庭：《从墨西哥中期选举看其未来政局走向》；贺双荣：《梅萨总统执政以来的玻利维亚政治形势》；赵重阳：《海地政治危机述评》；范蕾：《墨西哥恰帕斯危机十周年》；齐峰田：《乌里韦执政以来的哥伦比亚政治形势》。均载《2004~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⑧ 袁东振：《拉美国传统政党的衰败与可治理性危机》，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第30~35页。

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城市的社会分层改变了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动员方式。^①还有的学者强调了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政党与政府关系脱离的严重危害性。^②

有些学者对拉美国家的一些政党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墨西哥国家行动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但在政党制度建设和党政关系领域一直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其原因在于,国家行动党始终没有制定一个关于政党制度改革的长期计划,对党的结构和党内生活实行的渐进式改革呈即时性特点。福克斯执政时期党政关系的非传统模式并不是对传统模式的矫枉过正,而是国家行动党历来对制度建设缺乏重视和内部组织结构的局限性等原因造成的。对福克斯而言,其施政措施受到议会的很大制约;从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上看,国家行动党内部矛盾突出,党政关系不协调;从当前墨西哥主要政党的力量对比看,国家行动党也面临严峻的挑战。^③

有的学者研究了1958年委内瑞拉确立民主政治体制以来的政治格局,认为在1993年以前委内瑞拉实际上形成了“两党政治”格局。此后,这种格局因新兴政党、特别是“第五共和国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而被打破。与传统政党相比,“第五共和国运动”政治基础相对薄弱,执政经验不足,但它也不乏优势:在党内,查韦斯拥有较高威信和绝对的领导权;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执政党与政府保持一致,查韦斯的提议和决策能在党内得到认同。^④

(五) 关于拉美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学者们加强了对国外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古巴共产党领导古巴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巩固和加强了其执政地位,提高了执政能力,得到绝大多数古巴人民的拥护。古巴共产党主要从11个方面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党章党纲;重视组织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风建设,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战”,防止“和平演变”;加强道德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政权建设,健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注重经济与社会和科教的协调发展;调整宗教和侨务政策,争取更多的宗教界人士和海外侨民同情并支持古巴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军队在备战和建设中的支柱作用;调整外交政策,开展多元外交。^⑤还有的学者总结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失去政权的原因:放弃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原则,经济政策失误,党的职团结构功能弱化,治党不严,连续实施的政治改革扩大了反对党的活动空间。^⑥

(六) 关于拉美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

拉美是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从中不难找出腐败问题的不少特点。有的学者指出,拉美地区的腐败有其传统因素,民众普遍存在对腐败无可奈何的心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但腐败问题却日益加重,这说明腐败与高速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⑦

许多学者认为,在拉美地区,智利的腐败问题最轻,其基本经验是用制度的力量遏止腐败。智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发展成一个相对严重的制度性问题。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智利建立了一套反腐制度体系。^⑧

有的学者指出,巴西劳工党领导层和劳工党政府于2005年接连出现贿赂丑闻,致使劳工党和劳工党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和支持率下降。劳工党和劳工党政府要想继续执政,必须保持自身廉

^① 谢文泽:《拉美城市的社会分层及社会和政治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28页。

^② 陈英:《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问题的两个视角》,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第91~93页。

^③ 刘维广:《墨西哥国家行动党的渐进式改革以及党政关系的非传统模式》,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49~53页。

^④ 林华:《委内瑞拉执政党如何应对社会矛盾》,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5~21页。

^⑤ 王立强、郑秉文等:《执政党建设:国际经验与教训》,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8页。

^⑥ 李国伟:《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失去政权的原因》,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3期,第38~43页。

^⑦ 王立强、郑秉文等:《执政党建设:国际经验与教训》,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8页。

^⑧ 王立强、郑秉文等:《执政党建设:国际经验与教训》,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8页;闵勤勤:《智利的腐败问题和反腐败制度体系探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38~44页。

洁，必须继续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特别是同内部的腐败现象作斗争。^①

（七）关于拉美左派

多数学者认为，进入 21 世纪，拉美地区影响最大的政治变化就是左派的重新崛起。左派力量在拉美几个国家掌握政权以及在影响日益扩大的世界左翼论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其重新崛起的重要标志。拉美左派的重新崛起是通过和平的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的。^②学者们普遍认为，贫困化、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是导致左派崛起的主要原因，其他因素还包括：拉美地区的反全球化运动促进了左派力量的重新崛起，“第三条道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拉美左派提供了理论指导，拉美国家普遍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不平等程度加重等。也有学者强调，拉美左派所奉行的理念不是主观臆造和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对拉美社会现实的反映。^③

拉美左派提出了各种新的政治主张。一些学者重点研究了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认为它们是拉美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影响力的左派进步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论坛。论坛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倡导合法斗争、替代现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争取民主未来和全球善治的主张，集中代表了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中弱势群体的呼声。^④有的学者指出，圣保罗论坛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面临着复杂的挑战：论坛缺乏形成统一的、明确的、独立的思想体系的能力；论坛虽然从整体上具有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旧殖民主义、反对歧视主义的色彩，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有分歧；尽管多数拉美国家的广大民众已不再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尤其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思想中仍占主导地位。^⑤有的学者认为，被称为“穷人联合国”的世界社会论坛与全球权力精英主导的“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现已成为世界各大洲中左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运动广泛参与的“反帝、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前沿阵地。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的成功举办反映了拉美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公民运动的兴起和公民社会的发展。^⑥

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左派领导人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其政策主张倾向于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温和的调整，而非激进的革命。左派政府上台后，都将社会公正摆在经济增长之上，把提高就业率、救助贫困人口作为施政重点，以巩固执政基础。^⑦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左派的崛起，其主流方向是积极的，带给拉美国家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⑧

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左派仍处于积蓄力量阶段。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拉美走出“发展—危机”这个不断重复的怪圈，是摆在拉美左派领导人面前长期而艰巨的任务。^⑨有的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虽然为“替代模式”的实现提供了契机，但“替代模式”的实现仍“任重而道远”。^⑩

（八）关于古巴社会主义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古巴的研究继续深化。有的学者在全面和系统地研究古巴社会主义的历

^① 徐世澄：《巴西劳工党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做法》，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9～14页。

^② 谌园庭：《拉美左派崛起浅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1～42页；高建生：《从拉美到印度：发展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警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第91～94页。

^③ 谌园庭：《拉美左派崛起浅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0～41页；李阳：《拉美左翼力量崛起评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第39页。

^④ 贺钦：《拉美左派力量和公民运动的前沿——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的特点及其意义》，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8页。

^⑤ 范蕾：《圣保罗论坛的“替代”色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6～47页。

^⑥ 贺钦：《拉美左派力量和公民运动的前沿——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的特点及其意义》，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8～51页。

^⑦ 谌园庭：《拉美左派崛起浅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2页。

^⑧ 李阳：《拉美左翼力量崛起评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第38页。

^⑨ 谌园庭：《拉美左派崛起浅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2页，第47页。

^⑩ 范蕾：《圣保罗论坛的“替代”色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7页。

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认为古巴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认为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在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党和好的领袖;在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国中搞社会主义,共产党应该是民族解放斗争传统的继承者和民族独立地位的捍卫者;现代社会所应信奉的基本理念是公正、共享和发展;不断提高政治文明的程度是社会主义的三大追求目标之一;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所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①有的学者指出,古巴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特殊环境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近10年来实行了“稳步的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古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及其经验,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②

三 对拉美国际关系的研究

(一) 关于拉美国家间的关系

2005年2月14日,查韦斯总统与来访的卢拉总统签署了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的联合公报,以共同促进和发展两国的生产力,共同制定消灭贫困以及满足两国人民食品、健康、教育和住房需求的计划。此前,两位总统还签署了26项有关两国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协议。^③

2005年4月29日,卡斯特罗主席与正在古巴访问的查韦斯总统重申,要携手抵制美国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代之以“玻利瓦尔美洲”。^④

2005年年初,“戈兰达事件”成为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之间的重大外交事件,由此引起了两国之间的外交战。^⑤2005年2月15日,乌里韦总统对委内瑞拉进行了短暂访问。两国元首在长时间的闭门会谈后宣布:困扰双方的外交危机已解决,双方决定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这表明两国关系已摆脱“戈兰达事件”的阴影。^⑥

2005年3月1日,乌拉圭新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宣誓就职,古巴外交部长佩雷斯等外国政要出席。在巴斯克斯宣誓就职仅3小时后就宣布,乌拉圭恢复同古巴的外交关系。2005年3月2日,新的古巴使馆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落成并开馆。^⑦

(二) 关于美拉关系

有的学者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其理想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但在实践中这一政策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一是表现在美国极力试图在拉美地区推行所谓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但从20世纪末起,拉美的左翼运动不断发展;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效果很不理想;三是作为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支柱的自由贸易政策遇到了很大阻力;四是正是由于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自由贸易政策,使拉美国家的毒品贸易和非法移民问题日益严重。^⑧

美国与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关系进一步紧张。2005年1月,赖斯国务卿指责古巴为“独裁政权的前哨”。7月28日,赖斯任命凯莱布·麦卡里出任古巴“政权更迭协调人”及2004年美国资助建立的“自由古巴援助委员会”协调人。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2005年1月,赖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责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负面力量”。美国通过全国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向委内瑞拉反对查韦斯的政治组织提供资金支持。5月,布什总统在白官会见了反查韦斯的政治组织苏马特领导人马查多。美国继续指责“查韦斯政府利用巨大的石油资源资助玻利

^① 毛相麟著:《古巴社会主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22~330页。

^② 肖枫:《关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第33~39页。

^③ 林民忠:《委巴两国建立“战略联盟”》,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16日,第3版。

^④ 赵卓昀:《查韦斯与卡斯特罗联手“抗美”》,载《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5月1日,第4版。

^⑤ 刘宏:《拉美两国大打外交战》,载《人民日报》,2005年1月18日,第3版。

^⑥ 刘宏:《哥委两国握手言和》,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17日,第3版。

^⑦ 张蕾:《乌古两国重归于好》,载《人民日报》,2005年3月4日,第3版。

^⑧ 朱鸿博:《“种瓜得豆”——美国理想主义拉美外交政策与近期美拉关系》,载《社会观察》,2005年第10期,第34~35页。

维亚、厄瓜多尔和其他地方的反民主集团”。查韦斯总统从俄罗斯和西班牙购买武器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使以色列取消了与委内瑞拉的一笔价值100万美元、为委内瑞拉更新F-16战斗机的交易。对于委内瑞拉与古巴日益加深的战略联盟，美国感到不安。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促使查韦斯总统越来越站在美国的对立面。2005年4月22日，委内瑞拉政府中断了与美国长达35年的军事合作项目。2005年4月26~30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先后访问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和萨尔瓦多。在此次拉美之行中，赖斯一改过去公开抨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作风，把种种“倒查”计策放到幕后进行：刻意避免提到美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委内瑞拉；在公开场合对查韦斯保持克制的同时，赖斯却在幕后谈判桌上对查韦斯射出一支“冷箭”——赖斯向哥伦比亚政府提出，对查韦斯从俄罗斯购买10万支自动步枪的军购计划进行监督，以防这些武器落入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手中^①。

（三）关于中拉关系

胡锦涛主席在最近对拉美国家的访问中提出了中拉关系在各个领域发展的目标：在政治上相互支持，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在经济上优势互补，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在文化上密切交流，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同时，胡锦涛主席还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方式，即深化战略共识，增强政治互信；着力务实创新，挖掘合作潜力；重视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②

有的学者指出，世界发展进程中的拉美，是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的地区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多极化和区域集团化发展中一支上升的力量，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发展进程中的拉美整体上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时期。作为最早走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道路的发展中地区，拉美一方面率先走出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率先迈入倚强图强和联合自强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也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制度弊端造成的内外矛盾和问题的困扰，发展模式在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发展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演化后，面临从“华盛顿共识”到“拉美共识”的新一轮探索。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拉美，是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可以信赖的朋友，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可以依靠的朋友，是具有较强互补性和利益相关性的经济伙伴，是全面合作潜力很大的重要集团力量。^③

有的学者指出了发展中拉关系值得探讨的四个方面：一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和拉美国家在政治上的合作，二是如何推进和拉美的经济合作，三是如何促进科技和文化交流，四是如何促进民间交流。^④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重视拉美的原因：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中国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就经济总量而言，拉美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地区，因此，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拉美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拉美文化悠久、地大物博，中国也有着悠悠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有着丰富的资源；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国三大历史任务之一，我们十分感谢拉美一些国家和广大人民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⑤

2005年1月22日至2月3日，曾庆红副主席对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牙买加5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陪同曾庆红副主席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在回国飞行途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曾庆红副主席的这次拉美5国之行全面提升了中国同往访国的关系：中

^① 刘路：《赖斯“倒”查韦斯：明枪不灵改暗箭》，载《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5月3日，第4版。

^② 蔡武：《中拉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好时期》，载张小冲、张学军主编：《走进拉丁美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0页。

^③ 裘援平：《祝愿中拉关系蓬勃发展——在拉美形势研讨会上的致辞》，载张小冲、张学军主编：《走进拉丁美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2~13页。

^④ 成思危：《发展我国与拉美关系值得探讨的四个方面》，载张小冲、张学军主编：《走进拉丁美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3~11页。

^⑤ 李慎明：《加强重大问题研究 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2期，第5~6页。

国同墨西哥就充实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同秘鲁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同委内瑞拉就充实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形成共识，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决定建立互利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同牙买加确定建立共同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周文重副部长还指出，在曾庆红副主席访问期间重申或宣布，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及与中国建交的10个加勒比国家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秘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牙买加重申或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牙买加强调双方互不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①

有的作者在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石油投资进行回顾和分析后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尽管已有一定的规模，但与中国对海外石油的需求和国际石油巨头在拉美的投资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项目规模、供给能力和盈利能力等方面都略显不足。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石油投资不仅要为国内提供石油供应，还应拓展美国和拉美地区的石油市场，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②

2004年12月20日，巴西外交部国际谈判司司长阿斯兰尼安说，2005年巴西将深入探讨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可行性。^③

四 对拉美社会和历史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社会问题尖锐化

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地区社会问题尖锐化与其当前的社会转型、经济模式转换、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因素密切相关。（1）拉美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序化状态，政局动荡、社会不稳、城乡发展失调、地区差距扩大、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以及城市边缘地带的形成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得社会贫困问题特别尖锐。（2）在经济模式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从国家干预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社会弱势群体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由于弱势群体规模庞大，构成了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威胁。（3）从全球化来看，拉美国家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在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面临更为不利的境地，各国间和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不平等在恶化，失业风险和金融风险大大增加。（4）存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影响。拉美国家既存在市场机制造成的不平等也存在权力机制造成的不平等，而且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权力机制不但没有有效抵消市场机制造成的不平等，而且有时还与市场机制一起对不平等产生双重作用，使之更加严重。^④

（二）关于贫困化

贫困问题是拉美国家根深蒂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其原因很复杂：殖民主义造成了少数人占有生产手段和多数人缺少生产手段这种极不均衡的矛盾的积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进程在经济结构、权力结构不均衡状态下运行，改革取向向富有阶层倾斜而不利于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导致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乃至各行业之间不均衡性的加剧和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危机并没有导致权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这种结构性失效必然导致再分配政策的失效。

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对策，拉美国家面临的任务是：通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和健全公平和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及相关机制，增大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比重，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扩大受益者的社会覆盖面，多向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倾斜，确保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成员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等。

有的学者认为，为解决贫困问题，构建消除贫困的制度化机制十分重要，需要建立依法进行

^① 马剑：《为友谊而来 为合作而来 为学习而来——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谈曾庆红副主席访问拉美和加勒比五国》，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6日，第3版。

^② 刘强：《中国与拉美石油合作探讨》，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5~29页。

^③ 关晋勇：《美洲自由贸易区——马拉松谈判何处是终点》，载《经济日报》，2005年1月21日，第7版。

^④ 刘纪新：《拉美国家社会政策调整评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9~16页。

社会改革的工作机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推进社会政策的调整，建立和健全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失业保障的制度化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另外，需要积极促进反贫困的国际化机制的形成。^①

（三）关于收入分配不公

对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最新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20世纪50年代后的近30年，拉美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但增长部分的分配不合理。1981年以后的20多年间，拉美经济的衰退和低迷制约了对收入分配的改善，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受到很大影响。（2）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土地高度集中，土改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的收入分配结构；工业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入分配；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宏观经济不稳定；税收制度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健全；国民受教育机会不均等。^②（3）绝大部分财富和收入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手中，贫困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③（4）在社会转型、经济模式转换进程中，拉美国家政府没有有效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产生社会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学者们指出，如果拉美各国政府不能自觉地改革收入分配政策和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分配两极化状况的。

（四）关于拉美城市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

一些学者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中明显地存在着八个社会阶层，即资本家、高级管理人员、高级雇员、小业主、正规脑力劳动者、正规体力劳动者、非正规劳动者及其他未分类人口。前三个社会阶层仅占城市经济活动人口的4%左右，但却是整个社会的主导阶层，居收入分配的顶端，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其他几个阶层的收入水平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意味着拉美地区96%左右的城市经济活动人口没有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获益。城市社会的分层，一方面使拉美地区的犯罪率持续上升，海外移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改变了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动员方式。^④

拉美社会分化有其深层原因。首先，社会财富占有过于集中。上层统治阶级不断对社会财富进行兼并，同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拒绝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其次，忽视中小私营企业的发展。国家的政策支持过分偏重于私人大企业，对中小私人企业资本创业的“门槛”过高，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第三，对城市化创造就业的潜力盲目乐观，农村向城市移民和城市化失控，带来大量失业，非正规就业大量涌现，城市社会冲突激化。第四，国家未能有效地发挥社会收入分配的职能。社会保障制度、教育体制、国家税收政策等不完善。^⑤

（五）关于社会冲突

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国家产生社会冲突有许多原因，如宗教信仰不同、政治集团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不同、各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历史积怨、地区或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等。但最根本的因素是由社会不平等及各社会阶层、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的。他们认为，传统财产占有制孕育了社会冲突；城市化和转型加剧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分化，加大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有的学者指出，20世纪以后，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出现过4次高潮。有的冲突因政府采取了相关对策、相关集团的利益得到保障而得到缓解；有的冲突因各利益集团立场相差甚远而久拖不决；有的冲突甚至仍在不断加剧。社会政策是

^① 洪国起：《评拉美国家构建消除贫困的制度化机制》，载张小冲、张学军主编：《走进拉丁美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 江时学：《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为什么如此不公》，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5期，第3~11页。

^③ 谢文泽：《拉美城市的社会分层及社会和政治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23~28页。

^④ 谢文泽：《拉美城市的社会分层及社会和政治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23~28页。

^⑤ 苏振兴：《拉美社会分化的几点深层原因》，载张小冲、张学军主编：《走进拉丁美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4~209页。

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拉美国家社会政策的体制设计缺陷削弱了其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能力,具体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缺陷不利于消除各阶层的利益冲突;教育制度的缺陷不利于消除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公共社会开支使用的偏向性不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税收制度的缺陷使其难以发挥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社会改革没有发挥出社会稳定功能。^①

(六) 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拉美国家虽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上受西方理论的主导,但在其影响下,也产生了一些本土理论和思潮。如“先增长、后分配”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在一定时期具有不兼容性,首先必须实现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会使大多数人受益,从而使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其中包括巴西经济学家内托的“蛋糕论”和西蒙森的“积累优先论”。另如民众主义理论,主张国家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以消除依附性的发展;主张社会变革和实现社会正义,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消除或缓解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合理现象,主张采取改善民众福利和生活条件的政策。此外还有拉美经委会于50年代提出并在90年代进一步发展的发展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带有公正的生产改造”的命题,提出了生产发展、公平分配和保护环境的三位一体发展方案;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稳定增长、环境得以保护的同时取得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的新思想。^②学者们认为,拉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一个现实问题,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一方面,拉美本土理论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实践,在相当长时期内由源自西方的外源性理论所主导,未能形成符合拉美国家实际的发展观。另一方面,那些曾产生广泛影响的拉美本土理论(如发展主义)没能随历史条件的变化实现理论创新,影响力逐渐减弱。理论与实践未能实现有机结合,发展观念存在缺陷是拉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或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根源。

有的学者对巴西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这种不协调表现在诸多方面:如穷人所占比重很高;5个地区之间和26个州之间发展程度差别巨大;民族成分之间表现出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影响巴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因素是: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国民教育相对落后以及教育模式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致使普通国民收入受损,社会领域投资不合理。^③

(七) 关于社会政策

我国学者对拉美国家社会政策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化。第一,深入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和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拉美国家现行社会政策中存在问题的尖锐性。主要问题是社会开支不足与资源配置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问题,缺乏制度化的反贫困政策,社会保护具有亲周期性以及政策理念存在失误。第二,着重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对社会政策的大规模调整。调整内容包括:调整社会开支政策,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再分配从过去主要关注城市中间阶层向最需要的社会群体倾斜,发挥社会开支的再分配作用;重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制度;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计划,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保护;改革管理机制。^④第三,指出拉美国家的社会政策存在体制性缺陷,即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缺陷,教育制度的缺陷,税收制度的缺陷,公共社会开支使用的偏向性以及社会改革没有发挥社会稳定功能,许多国家的社会改革不彻底。^⑤

拉美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减贫政策:调整社会开支政策,加大面向穷人和弱势群体社会投资;制定目标明确的新一代综合性反贫困计划,采取现金补贴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扶贫

^① 袁东振:《对拉美国家社会冲突的初步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3~8页。

^② 袁东振:《对拉美国家经济与社会不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7~22页。

^③ 张宝宇:《巴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17页。

^④ 刘纪新:《拉美国家社会政策调整评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9~16页。

^⑤ 袁东振:《对拉美国家社会冲突的初步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3~8页。

方式；提高社会投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让真正的穷人受益，从为穷人提供收入和消费补贴转向对贫困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教育、医疗卫生、营养等方面下功夫。^①

一些学者着力分析了拉美各国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不同特点。有的学者指出，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进行的社会改革特别强调实现社会正义、改善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实施向中下层民众倾斜的社会政策，在社会领域取得了明显进步。^②有的学者指出，巴西卢拉政府加大社会改革力度，实施“零饥饿计划”“第一次就业计划”等，着力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取得了初步成效。^③

（八一）关于华侨华人历史

有的学者深入研究了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拉美华侨华人对当地的贡献以及他们的中国情结。拉美华人主要是历史上契约华工、华侨的后裔，以及后来的华侨和移民。19世纪拉美的“契约劳工制”实际上是“苦力奴隶制”，契约华工的历史是一部洒满血泪和仇恨的历史。^④

（九二）关于墨西哥殖民地时期大庄园的债役雇农制

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大庄园普遍实行债役雇农制。这种劳动制度是在殖民地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程度低下，没有能够形成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形成的，是一种具有超经济强制特征的剥削方式和封建性的剥削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学术界在认识债役雇农制方面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债役雇农制使得大庄园主有效地束缚了债役农的人身自由。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在这种制度下，大庄园主才为债役农提供了生活保障。^⑤

（十三）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虽然与巴拿马签署了关于归还运河主权和保持运河永久中立的两项条约，但是仍“保有以武力维护运河中立的权利”。美国政府同意归还运河，是出于更广泛而长远的利益权衡，顺应时势的结果。巴拿马政府对美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同时也做出了重大让步。^⑥

^① 刘纪新、闵勤勤：《拉美国家的贫困问题现状》，载《2004~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95~103页。

^② 林华：《委内瑞拉执政党如何应对社会矛盾》，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

^③ 徐世澄：《巴西劳工党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做法》，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6期。

^④ 吴德明：《拉美国人的历史与现状》，载张小冲、张学军主编：《走进拉丁美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0~397页。

^⑤ 王文仙：《论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大庄园的债役雇农制》，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第84~92页。

^⑥ 翟晓敏：《美国为何归还巴拿马运河》，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第67~77页。